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

秦代 印风

重庆出版社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

秦代印风

总主编 黄 惇
本卷主编 许雄志

重 庆 出 版 社

总策划： 李书敏
周永健

总主编： 黄 惇
本卷主编： 许雄志

责任编辑： 周永健
裴小蕙

印章释文校阅： 张一农
吴茂礼

技术设计： 郑汉生
封面设计： 邵大维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

秦代印风

QINDAI YINFENG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制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5

1999年12月第一版 1999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366-4115-X/J·525

定价：60.00元



凡 例

一、《历代印风系列》, (以下称《系列》) 计 21 卷, 分卷为三个类别: ①先秦至清初用断代的方式划卷, 该类计有《先秦印风》、《秦代印风》、《汉晋南北朝印风》(上)、(中)、(下)、《隋唐宋印风(附辽夏金)》、《元代印风》、《明代印风》、《清初印风》等 9 卷。②清代至近当代以印章流派分卷, 该类计有《清代徽宗印风》(上)、(下)、《清代浙派印风》(上)、(下)、《赵之谦印风(附胡钁)》、《吴昌硕流派印风》、《黄牧甫流派印风》、《赵叔孺、王福庵流派印风》、《齐白石、丁二仲、经亨颐、简经纶、来楚生印风》等 9 卷。③以印章的特殊类别分卷, 该类计有《历代印甸封泥印风》、《历代图形印吉语印印风》、《明清瓷器押印印风》等 3 卷。

二、《系列》撰有总序, 以明白书之编撰宗旨; 有专论, 以研究各卷所涉印章的学术、艺术问题; 其中部分卷有年表, 以提供各卷所收印章、印人、印事的研究素材; 有印人传, 以提供流派印人的生平、时代背景材料、著述等资料, 以便读者对印人有更多的了解。其中部分卷未设年表、印人传, 或有年表不设印人传, 其原因为两种: ①有的卷因所收印章的年代久远(如先秦、秦代、汉魏、南北朝等)印学资料严重不足, 故省略年表; 因流派印尚未产生, 故不设印人传。②少数分卷已将印人传的内容并入专论中, 故亦省略印人传。

三、《系列》各卷尽可能按时序排列先后, 不能确切考辨其刻制时间者, 则据其风格特点归类排列。

四、《系列》各卷印章的释文, 尽可能考识为今用简化字, 目前尚不能考识的印文以“□”形符号注明, 目前我们尚无法识读的印章(如辽、夏、金、元等部分印章)则标明“待考”, 以供进一步的研究。

五、《系列》各卷所收印章, 为照顾版面的美观, 均未编号, 故释文按版面印章的分布分行排列, 以便读者按行对应释读印章。

中国历代印风总序

黄 惇

印章,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现存的实物证明,早在殷商时期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社会交往的凭信,已经使用了印章。此外在制陶工艺中,古代的劳动者所使用的陶拍与戳子,在使用上与印章之手段相合,抑或它原本就是产生印章的重要源头之一。作为凭信的印章与作为劳动工具的戳子,在长期发展中合流,成为印章绵延数千年存在的基础。在实用印章阶段,秦汉时期堪称鼎盛。六朝以降,印章开始与书画艺术结缘,书画上的鉴藏印成为印章向纯艺术过渡的契机。由于文人将印章不断引进书画,并注入更多的艺术因素,至元代始演化为—门自觉的文人艺术。在元代不仅确立了印宗秦汉的审美观念,且出现了集自写自刻于一身的文人篆刻家。此后经明清文人的努力,在印材、技法、创作思想、艺术理论诸多方面逐渐使篆刻艺术得以丰富和完善,至此印人辈出,流派变换,风格绚烂,蔚然成风。这样明清两代作为文人篆刻艺术的高峰期,与秦汉时期的实用印章被称为印章史上的“双峰”。在文人篆刻艺术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民间手工业中的印章也以自己的传统向前发展,尽管他是非自觉的,但依然孕藏着艺术的创造,宋元时期的押印和明清陶瓷上的押印集中体现了这一方面的发展。

自唐代以来,便出现了记录印章的印谱。印谱从最初的原始形貌至今,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各时期的各种印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其一是集古印谱,即将历代留传与出土的古代印章汇集于一谱,它兼有考古和鉴赏的双重功能。其二是摹古印谱,它是晚明以后,印人为学习古代印章自己动手以各种印材摹刻后钤拓成的印谱,其目的用以展示印人在临古上的传统功力。其三是创作印谱,即文人篆刻家将自己创作的印作并侧款钤拓汇集成谱,它是篆刻家艺术作品的集中体现。将一个时期诸位篆刻家的印拓或将同一流派的篆刻家印拓辑于一谱,实际上是若干创作印谱的合成。因此印谱之类别舍以上三种则无其他。

《中国历代印风系列》的收集,囊括了从商代至近世的历代印章,从印谱的分类上则可以说是诸类印谱的综合。我们知道由于印章本身所具的内涵,编辑印谱的动机并非出于相

同的立场。例如 60 年代罗福颐先生集辑《古玺汇编》就主要出自考古学的立场。与之不同,《中国历代印风系列》虽然必须借鉴和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对印章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着眼于“印风”——即印章的艺术风格,因此它的视角主要是从艺术学的立场出发的。

在元代之前的实用玺印分类中,我们注意到了两条必不可少的线索。一是时代顺序之线索,二是艺术形式之线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造成诸种实用印章所具有的艺术形式的因素,如印章用途、印章形制、印章制度;入印的文字差异、地域的差异;印材的差异及不同的刻制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决定着印章艺术形式的不同,决定着印章艺术风格的变异。并且因这两条主线索与诸多决定形式美的因素交叉影响,形成了实用印章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为此,如何以艺术形式来确定艺术风格的分类成为我们工作的重要课题。

同样,欲清理元、明、清以来流派篆刻艺术的各种风格类型,也并非一件简单的事。首要的事情是确定代表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因此必须拂去时代尘埃的覆盖,做一番去伪存真的考辨。关于印人的流派归属与界定、印风的形成与变化,都需要史料和印作图版的支撑,尤其对于那些流派篆刻艺术史上模糊不清的问题更是如此。鉴于《中国历代印风系列》的特殊视角和分类方法,我们希望在编辑过程中对现存的许多问题有所清理并取得研究上的突破,以使人们对各时期印人、流派的印风有一明晰的认识。出于对历史上印章文化的全面观照,《中国历代印风系列》还十分注意民间用印的收集和整理,诸如历代印玺、元代押印、以及明清青花瓷器押印等等。以使读者了解历代印章发展中的另外一侧。

概言之,《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是以艺术风格的分类展现于读者面前的。因此我们期望其不仅对研究篆刻艺术的专家来说是一套有价值的史料图谱,也期望其成为篆刻家和篆刻爱好者们有价值的艺术资料和学习范本。从中既可看到各时代、各流派不同印风的代表作品,了解印风的形成与盛衰,也可以看到流派的承递与篆刻家的成长之路。

目 录

凡例·····	1
中国历代印风总序·····	1
秦印概说·····	1
图版	
秦代官印·····	17
秦代私印·····	41
后记·····	253

秦 印 概 说

许 雄 志

一、关于秦印认识的发展

历史上人们对秦印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清楚的过程。早在元代,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它的存在。元代中期杨遵所集纂的《杨氏集古印谱》中有王沂的序赞,文曰:“……键为之磬,汾阴之鼎,秦玺汉剑,曲阜之履历,世传以为宝……。”此段文字已经提到“秦玺”。元末文人刘绩在其所著的《霏雪录》中也提到了秦印,他说:

柯博士九思在奎章阁,尝取秦、汉以还杂印子,用越薄纸印其文,剪作片子,帖襟成帙,或图其样,如“寿亭侯印”,双钮四环之类,为二卷。余尝见之。

刘绩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柯九思的集古印谱中主要收集的是秦、汉印。但元人所及只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概念,究竟“秦印”是什么面目?还是模糊不清的。

直到晚明的万历十七年,在张学礼集辑的摹古印谱《考古印文正藪》序中,仍反映出对古玺印断代的疑惑与迷惘,他说:“至于先代玺文印章,湮于水土、暂出人间者,犹可考文,其间世迁代易,或各相同,衍相类者,亦无能辨其孰为秦、汉?孰为隋、唐也?”但是在疑问的背后,却说明当时的篆刻家已在关注着如何将秦、汉印作断代区别的难题。如甘暘在他的《印学集说》中令人注目地说道:“秦之印玺,少易周制,皆损益史籀之文,但未及二世,其传不广。”明确的提出秦印“少易周制,皆损益史籀之文”。这篇明万历二十四年的《印学集说》在论及印制时说:“秦、汉印有方者,也有条者,皆正式。”这里说的“条者”,正是秦印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印式。这说明到了明代后期人们已能较为准确的摸到秦印的脉络了。同时代的徐上达在万历四十二年完成了他的一部印学专著《印法参同》,总四十二卷,其中第五卷“量材料、审措置”一节中说:“格式既定,自决从速。如从秦则用秦文,从汉则用汉篆。”作者已经将



图一



图二



图三

秦印汉印的风格从用字特点上加以分开了。以上基本代表了元明两代文人对秦印的认识，虽然有一定的成就，但基本上说还不成体系。

到了清代中叶，人们对秦印的认识依旧是模糊的，夏一驹在《古印略考》中对秦印这样描述：“秦铜印，其小方阳文，多边阔，其配偶错落，紧密不容针……”云云。这显然是把战国小玺误认为秦印了，同期的孙光祖在《古今印制》中也有类似之观点。道光年间著名的篆刻家赵之谦，在他所刻的“郑斋”（图一）一印的边款中这样刻道：“悲庵拟秦印为均初刻郑斋记。”一直到清末民国间的著名印人黄士陵，亦在“遁斋”（图二）一印的边款中刻道：“有秦小印面目”。这两方印均作阔边朱文，因此实际上赵之谦与黄士陵刻的都是战国玺印的风格，而决非秦印面貌。

秦国的先世是居住在西戎之间的嬴姓部族。西周灭亡时，秦襄公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从此秦国在周的故地兴起，并逐渐繁荣强大，秦以陕西的渭河流域为中心，先后以泾阳、栌阳、咸阳为都。但直到战国时期，秦国的疆域并不大，且地处中国的西部，与中原各国交流并不多，《史记》中说：“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狄遇之。”可见中原各国对秦的歧视，在与东方少交往而半封闭、半隔绝的情况下，秦国的自身发展自然有着独特的地域色彩。从秦墓葬出土的器物与秦墓的葬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谈及秦墓葬时说：“秦墓主要是方形竖穴土坑，下肢屈肢特甚的屈肢葬，在秦墓中非常普遍，几乎可视为秦墓的特殊标志。”而墓中常出土的如蒜头壶、茧形壶、浅腹粗足鼎等等，均为秦墓中的典型器物，同时期其他地域的墓葬中所罕有。秦国的发展比中原各国要迟缓，且有一定的保守性，较多保留了周的传统。秦国的文字自然有着独特的面目，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权力及凭信的印章，使用的印文，其自身同样具有独特的地域色彩。明人董说曾谓：秦国“有司之赐印，自秦孝公变法始耳。”从出土的秦简中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秦国已经普遍施行了任官赐印制度，印玺在当时已经使用得非常广泛了。

那么，什么是秦印？严格地说，秦印应指秦统一之后到秦灭亡的这 15 年间制作的印章。



图四



图五



图六

但秦统一之后虽然遗留下了大量的刻石、度量衡器、诏版铭文等，但就流传至今的秦印实物来看，因无款识纪年，很难断定其绝对年代。即便是秦 15 年间墓葬中出土的印章，其墓主人早年生活在战国时期，所以印章仍然有可能是制作于战国时期的。在考古学上把统一前后的秦作明确的划分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认为秦印应包括秦统一六国前的数十年在内。罗福颐先生在《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一文中说：“秦汉私印之断代，过去是比较模糊的，《十钟山房印举》不分秦与西汉私印，而称作周秦，要知此类印，只应称作秦汉，今日我们的秦印标准是据秦权量上文字书法来断定的。”王人聪先生在《秦官印考述》中说：“秦印分官印私印两大类，秦官印的辨认，除了根据印文字体的特点之外，还可以通过对印文所署官名、地名沿革的考证来确定。”这些方法为断定秦印提供出有力的证据。本卷《秦代印风》，收集了秦印近 1400 方，这是目前数量最多的一次，其主要来源不仅包括历代印谱中的秦印，近世出土的秦印和历年来已发表的各大博物馆所藏秦印，也收入了许多当代藏印家所藏的秦印。本卷收入的秦官印、秦私印，将先秦秦系古玺排列在前面，目的是使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秦印的发展源流轨迹。

二、秦代的私印

秦印中比例最大的是私印。建国以来，考古工作不断深入发展，野外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秦墓的发掘中，陆陆续续出土了一些印章，虽然都是私印，且未必都是确切的秦十五年制作的印章，但它确是研究秦印的可靠实物资料，兹列录于后。

(一)“志纵”印(图三)，铜质，西安半坡村战国墓葬 M51 墓出土，原报告定此墓的年代为战国。

(二)“冷贤”印甲(图四)，玉质。

(三)“冷贤”印乙(图五)，玉质。



图七



图八



图九

以上二印同为 1975 年秋江陵凤凰山第 70 号墓出土,此墓属于秦昭襄王时期。此二印的字体属小篆范畴,与楚文字有别,可知亦为秦印。

(四)“高”印(图六),铜质,鼻钮。1954 年重庆巴县冬笋坝船棺墓冬 M2 墓出土。

(五)“敬事”印(图七),铜质,坛钮。重庆巴县冬笋坝冬 M49 墓出土。

(六)“富贵”印(图八),铜质,鼻钮。重庆巴县冬笋坝冬 M49 墓出土。

(七)“万岁”印(图九),铜质,鼻钮。重庆巴县冬笋坝冬 M49 墓出土。

(八)“中仁”印(图十),铜质,鼻钮。重庆巴县冬笋坝冬 M50 墓出土。

(九)“中仁”印(图十一),铜质,鼻钮。重庆巴县冬笋坝冬 M50 墓出土。

以上出土各印经考古工作者的考订,定为秦代。

(十)“咸廊里口”印(图十二),陶质。

(十一)“彭祖”印(图十三),铜质,鼻钮,1×1cm,通高 0.9cm。

(十二)“徒唯”印(图十四),铜质,鼻钮,1.2×0.8cm,通高 1cm。

以上三印为陕西秦都咸阳故城遗址出土,同时出土的遗物还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等物,可知三印的年代亦属秦代。

(十三)“杨口”印(图十五),铜质,坛钮,长方形,边长 1.1×1.9cm,通高 1.2cm,印面作日字界格。

(十四)“求丑”印(图十六),铜质,坛钮,长方形,边长 0.9×1.3cm,通高 1.1cm,印面作日字界格。

(十五)“补口”印(图十七),铜质,坛钮,长方形,边长 1.1×1.2cm,通高 1.5cm,印面作日字界格。

(十六)“王子”印(图十八),铜质,坛钮,长方形,边长 1×1.8cm,印面作日字界格。

以上四印均系四川芦山县出土,四印字体均系秦篆,属秦印。

(十七)“苏建”印(图十九),铜质,坛钮,方形,边长 1.5×1.5cm,印面四周有边栏。



图十



图十一



图十二

(十八)“王夸”(图二十),石质,覆斗钮,方形,边长 1.5 × 1.5cm,无边栏,两印系陕西咸阳黄家沟战国墓 M48 墓出土,据墓葬形制及同出土的遗物特点,定该墓葬年代为秦代,此印印文为小篆,系秦印。

以上为历年出土的秦印中一些代表,从发掘简报中可以看出:

秦私印以铜质为主,间有石、玉、陶质,印形主要以长方和正方形为主,个别的作曲形,印钮通常为坛形鼻钮。作覆斗钮的,基本上是玉石质印章,这些与中原各国的玉、石质印章的钮制一致,印文大多数为刻凿的白文,亦有一部分为朱文铸印。从这些出土的秦私印及历代留传的秦私印来看,秦私印除了印章形制较为特殊外(长方形居多),印钮也有独特的地方,中原各国的玺印中的坛形鼻钮,一般为一层,而秦私印则为二层至三层,有的数层,且印章本身多经过防腐处理,即俗称之“水银沁”,或“水银古”,常常是一印在手,不须观看印文便可知其为秦印,其独特性、典型性是有目共睹的。

与长方形秦印所不同的,即有相当数量的正方形秦印出土和存世,其钮制与长方形的绝大多数一致,只是在形式上有人常常将其混作西汉时期的私印,这本属正常。其实不论秦系还是楚系,私印非官印,印章形式全由当时人们的选择而生产制作,秦方形私印,本身即从战国时期过渡而来,其实保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正方形,虽然在发掘的报告中未有圆形秦印出土,但存世的秦印中圆形印也占相当一部分。《故宫博物院藏印》、《上海博物馆藏印选》及《中国美术全集·玺印卷》等权威印谱中,对一些圆形小印(包括方形小印)的编排位置,直接说明了问题,这些印均为非发掘品,没有地层资料,判断其年代的依据和标尺一则为印钮,一则为文字风格,许多大型的印谱(附有清晰的印体照片)将一些秦代的方形小印断为汉代,其实这些小方印实际是秦印,至少也是西汉初期的秦系印章。统一后的秦王朝实施暴政,虽然在政治上统一,然而各地的反秦情绪却实际存在,社会存在动荡的内隐,曹锦炎先生在《古玺印通论》中引用张颌先生的观点,反映了斯时“对秦国典章制度的违抗”,曹锦炎先生认为“张说有一定的道理”。其实这不仅仅是有道理的,一种政权可将政治制度改变,若将文化习俗在短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时间内改变是不可能的。各地虽被秦兼并,但对秦的政令、文化及意识形态的抵制情绪,在秦朝灭亡后,自然被释放出来。时人常论及汉印制度包括尺寸、钮式时仍认为沿袭了秦制,其实尺寸在 2.3 至 2.4cm 左右的官印格式,并非秦统一后才有的,战国时期此类的尺寸官玺即比比皆是,只是这种尺寸的合理性被秦所认可罢了。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还有穿带两面印,1955 年出土于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初期墓葬的一方穿带两面印“梁奋”、“臣奋”(图二十一),这方印章与传世的秦两面印“江去疾”(图二十二)比较,成印时间至多相距数十年,可两印的印文风格差别竟如此之大。地域文化的不同,导致了这两方同属一个大时期的私印风格如此迥异,从存世的相当数量的汉穿带印来看,汉穿带印多为一穿,且是方穿,通常作,而秦印穿则为圆穿,双穿者也是一个主要特征,通常为或形,汉穿带印大部分为铸,而秦大部分为刻,这也主要说明了地域文化和时期的差异导致了工艺制作的不同。私印的性质有别于官印,其最能反映一个时期一个区域的实际情况。

三、秦代的官印

秦官印的研究成果则比私印丰硕得多,虽然就目前来说尚未有在秦墓中发掘出秦官印的报告,但从其官署名、地名沿革等方面可对秦官印作详尽的考释,与私印相比,其优势不言而喻。罗福颐《古玺印概论》,王人聪《秦官印考述》,曹锦炎《古玺通论》,王辉《秦印探述》等著作都对秦官印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考释。

传世的“王兵戎器”、“颤里典”、“工师之印”等为典型的几方秦系古玺。“乐阴右尉”、“铨粟将印”二印,其文字均圆转饱满,较富金文气息,与典型的秦凿印有明显不同,在钮式方面,此两印均为鼻钮。“乐阴右尉”一印,“乐阴”为地名,故城在今河北获鹿一带,“铨粟将印”一印,“铨”为地名,故城在现在的安徽宿县一带,从两印文字风格和印钮型制方面来看,都可感到与传世典型秦官印的明显差别。应属秦攻取此两地后由当地印工制作完成的官印,与秦地



图十六



图十七



图十八

秦制的官印风格是有区别的。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中说道：“……在东方的一些遗址则出土有秦人制造的兵器，例如燕下都就发现很多，无疑是秦并兼六国的遗迹。”印章无疑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这点也为我们对秦印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秦统一后，对一系列的制度进行了整改与划一，作为凭信和权力象征的印章自不例外，从方形官印的尺寸来看，其大约在 2.3cm ~ 2.4cm 之间，间或有超大超小者；长方形的官印的尺寸大约在 1.3cm ~ 2.3cm 之间，从存世的长方形官印印文来看，此类的官印职位较低。传世的秦官印绝大多数的印面上有界格，方形印为“田”字界格，半通印为“日”字界格，这是秦官印的一个主要特征。虽然战国楚系、齐系的一些官玺也有“田”、“日”字型界格，但只是作为一种形式存在，没有像秦官印有那么集中的体现。秦官印上的“田”字界格的起源，远可追溯到西周，扶风出土的大克鼎上，其铭文之间有明显的方格，西周末期的宗妇鼎，铭文之间也有整齐的方界格。传安阳出土的三方玺印形状的铜件中，就有一方是田字界格的（图二十三），但归根结蒂与秦印印文所用字数有关，秦官印用四字或二字，多者损之，少者增之。再之与秦为“水德”、“水主阴”有关。秦印文以四字或二字，而四、二均为偶数，也就是“阴数”，“田”、“日”字界格将印面划为大小相同的几个等份，是合阴之数。秦官印的这种形式自然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因此，田字界格几乎成了判定秦官印的一个重要特点。当然在存世的秦官印中也有少数没有界格，如“召亭之印”“修故亭印”，它们均为官职较低的小吏使用。然而尽管职位较低，却是方形，其形式与官职不符，印钮（坛形鼻钮）也与通常不符，此类较特殊的官印有可能是殉葬用的冥器。此外，如“咸郿里骄”（图二十四）“咸口园相”（图二十五）等等无界格印章，虽然也没有出土资料，但是与秦都咸阳遗址和秦兵马俑坑出土的印陶，可互为对应，如“咸郿里驱”（图二十六）从同在一瓦上的印陶“某地某工师之器”，可判断，它们是制陶业中使用的印记。有些学者将此类印归为私印，但这些印章形制硕大，且分有某地、某工、某人，一则便以辨别与监督，二则显然有标识性质的作用。此类情况不仅限于秦地，其他地域的工匠也常于器皿的某个位置打盖或烙上印记。因此，此类印章有官印性质，非纯粹的私用印。



图十九



图二十



图二十一

在已经确定的秦官印中一些印章的读法颇令人费解,即有相当一部分印文非按正常

3	1
4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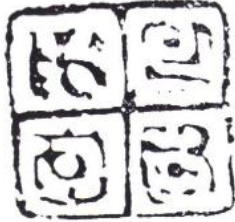
 读法来读的。粗略统计有:“泰上窳左田”、“小厩南田”、“小厩将马”、“右厩将马”、“章厩将马”、“修武库印”、“茆阳少内”、“法丘左尉”、“杜阳左尉”、“曲阳左尉”、“宜阳津印”、“咸阳右乡”等等。尽管其中数方印文释读尚有一定争议,但在释文无争议的如“曲阳左尉”,“杜阳左尉”等印,对读、旋读的印文时时可见。秦统一后,其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建立了一整套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官印的制作须统一由少府属官“符节令丞”掌管,印文是专门适用于印章的文字即“摹印篆”,并建立了等级制度,但在印文的顺序中出现的混乱,显出一种极大的随意性和无规则状态,这对秦代严格的制度来说,显然是不可思议的。以上举例的秦官印使用的都是秦篆,确切的讲都是摹印篆。王人聪先生在《考古发现所见秦私印述略》一文中指出:“文字的字体来说,战国时和统一后的秦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在风格上并没有什么重大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用小篆来统一文字,但只是对战国时期的秦文字作了一些省改和整理工作,实际上战国时期的秦文字和统一后的所谓小篆,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1975年发掘的江陵凤凰山70号墓中出土的“冷贤”甲印(图四),虽然专家们最终根据同出器物来判断将墓的年代定为秦昭襄王时期,但同出土的“冷贤”两印其中的一方为标准的“小篆”体,难怪起初人们认为这就是标准的秦印了。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秦新郿虎符跋》中指出“如战国晚期的秦新郿虎符,除了其中的‘甲’‘兵’‘在’‘凡’等少数几个字外,其余的全同于小篆。”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从出土的先秦商鞅方升上的铭文来看,与秦统一后的诏版、权量文字风格几无二致,用“皇帝信玺”(图二十七)这方封泥作标准,其印文是按顺序直读的,从战国时期的秦官印如“壬戎兵器”,“乐阴右尉”及有些战国玺印印文的读法上来判断,这批印文可对读、旋读的官印,其年代属先秦的可能性极大,当然这里也不排除秦官印的独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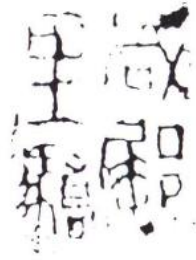
秦官印的钮式,基本可划分为ⅠⅡ两式,Ⅰ式为鼻钮,(见印钮图版)Ⅱ式为瓦钮,(见印钮图版)Ⅰ式印背四面倾斜上升,与印钮脚部相联接,如坛状。Ⅱ式,印身不起台,基本为一平



图二十二



图二十三



图二十四

面，钮脚与之相接，这类钮式在秦官印中占了大多数，我们可以从这些现象看出，在印钮方面，秦官印的钮式尚未有统一的定式。Ⅰ式印钮为少数，但它与战国时期的其它鼻钮官印相同，其有一定的互受影响和承接关系；Ⅱ式为大多数，此类钮式，可从“壬戌兵器”一印的钮式找到源头，此印印钮也同Ⅱ式的性质，只是钮身较为细小，印身不起台，钮脚直接与之相联接，到后来，印钮的宽度逐渐加大，演化成典型的瓦状印钮，Ⅱ式印钮为秦系印章所特有，此类钮式在同时期其它印系中鲜见，这点不仅限于官印，私印中此类钮式也占了相当的比例。

四、秦代的吉语印

在传世的秦印中，吉语印占了一定的数量，吉语印的所指实际是泛化的，印文的内容常为吉语、箴语、誓约和训诫之类，这些印文寓意深刻，富有哲理，因此有的学者又将这类印称之为成语印或词语印，不论如何定名，所指的是一类印章。吉语印在战国时期就很兴盛，印文内容丰富，形式争奇斗艳。秦吉语印与秦官私印有所不同的是，它不像秦官私印以白文为主，而表现为除了白文印外，朱文印也占有相当的比例。秦吉语印的大小悬殊十分明显，大的吉语印直径可达2~3cm，而小的吉语印直径只有0.5~0.6cm，这部分小印中有些印文为正文，且边框高出印文很多，按现在正常的钤盖方法，根本无法拓印出来，这点颇似古泉币的外廓高挺，防止磨损文字，这些印基本上不具有钤盖泥封的性质，纯属佩印；一些吉语印出土时，棱角锋芒，印身的多铜尚有残留，未经任何修整，这些印应属殉葬用器。

古人有佩印的习惯。卫宏《汉旧仪说》：“秦以前，民皆佩绶，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而吉语印的内容多以吉祥、规诫之类词意，佩于身上，或规范自己的行为，或表示对君主朋友的忠信，体现了浓重的儒教思想。此外也有护符祝福的美意，其共同性导致了市场的需求量，故尔，此类印章多是成批铸造的，利用一范制造大量的同一种词语的印章，这与同时代的铜镜、钱币的制作方法如出一辙，作为一种成品(商品)印在市上出售。正因为此，今天我



图二十五



图二十六



图二十七

们可以见到有些印文相同，尺寸钮式相同，甚至同出一坑，“坑口”锈色皆同的吉语印，难分彼此。

秦吉语印属非官印性质，故尔其在钮式和印文风格上较多保留了先秦的影子，印式有正方、长方、圆形、曲形等，钮式有一部分直接是与秦官印 I 式相同，往往不看印文，较难从钮式上分清孰为先秦，孰为秦。秦吉语印除少部分为刻制外，大部分为铸造而成，很多吉语印印文有浓厚的大篆意趣遗留。因为其属成批生产制作的商品印，先要制范刻凿印文，然后浇铸，字通过浇铸过程在热胀冷缩的原理下发生一定程度的形变，印面印身再经过修整锉磨，甚至加上防腐处理，然后才到市肆出售，所以印文原味已经面目全非了。再加上由于是批量生产，工艺流程中的各个工序未必是一人独立完成，而是一种集体的制作，因此这些因素导致了秦吉语印的印文风格与秦官私印中凿印字风的差异。以上原因再加上吉语印属非官印性质，工匠的重复制作，印文笔画减省，字型的变异错位等，使秦吉语印更具战国印的气息。

五、秦印的其它问题

关于印章的边款，许多学者一直认为起始隋唐时期，但澳门萧氏珍秦斋藏有一秦私印“郝氏”，印侧四周刻有“忿采冥，欲毋思”六字。（见澳门“珍秦斋古印展”图录）“郝氏”印阴刻，日字界格，为常见秦印中之半通印形式。所特殊者，此印体高约 1cm，阴刻于四侧的六字，长边刻 2 字，短边刻 1 字，字体与印面浑然一体，方圆兼用类秦诏版的趣味。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印章边款了。秦代的一部分玉印多在印身四周刻以纹饰，一些铜印印侧也有或刻或铸的纹饰，从商周至春秋战国，不论是那个地域，在铜器上刻字刻花纹是很正常的事，因此在印章的边侧刻文字当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样的例子仅见于此，如有更多发现，则更能说明问题。

在出土和存世的秦私印中，印面大多直刻其姓名，少有刻姓名之后再加刻“印”字的，战